

# 红旗增刊

HONGQI ZENGKAN

一九六四年 第 1 号



# 红旗

增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一号 ★

## 目 录

###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 ——新西兰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乔·威尔科克斯 (1)

### 马来亚人民的经历驳斥了

修正主义者的谬论 .....《马来亚箴言》月刊 (42)

☆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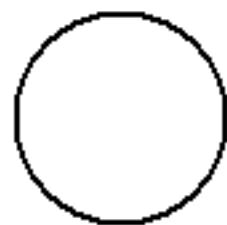


#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

## ——新西兰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維·乔·威尔科克斯

###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的小册子。由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两个重要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的解释存在着某些分歧，所以有必要发行这本小册子。这两个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才产生的。它们一般地指出了朝着可靠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前进的道路。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这两个文件具有重大的价值，它在这两个文件的进一步的帮助下发展了党纲——这就是我们拿到工作场所、拿到工厂和地方上去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政府不让我们在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那个纲领，在上次大选中资产阶级报纸实行封锁而不予报道的那个纲领。

那么，为什么会在对这两个文件的解释问题上产生这些分歧呢？我们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和领会得出来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匆匆忙忙地得出来的，而是在对现在可以得到的越来越多的有关整个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我们始终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发表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耽迷的主观的激烈言论。我们的确曾希望这些分歧能在各国共产党的大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而不要变成公开辩论的问题。如果过去在最初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现在也就不需要发表这本小册子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我们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就向有关各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被采纳。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抓住了这些分歧，加以歪曲和扩大，把它们作为阻挠全世界人民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愈来愈强大的进军的一种办法。它们把这些分歧看作是有助于支撑它们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某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你们想必已经从电台广播中听到过了，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了，从我国的



资产阶级报纸上、从《真相报》以及其他这一类的出版物上读过了。有人指责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工具，并且赞成把世界核战争作为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手段。

由于这一切，有必要使凡是愿意了解新西兰共产党看法的人，都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所阐述的来了解，而不是通过那些一向不仅激烈地反对共产党人而且还激烈地反对一切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和进步人士的人们所说的来了解。

这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

## 分歧同每一个人都有关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毫不相干。也许你对于什么叫“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管是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的确是与你有关的。它同一切要求和平和进步的善良的人都有关系。争论中的那些问题将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前进，通过消灭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来建立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新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不是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在把帝国主义从前门赶走以后，新殖民主义是不是会从后门再进来。

在新西兰，这场争论中用了许许多多深奥的字眼和论证，它们涉及通过“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涉及人民群众在“核世界”中是否仍然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时间的因素是否已经使“领袖们”处于支配地位；还涉及帝国主义没落的时代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的性质；涉及议会在这个“新时代”里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是早在我们本国的劳工运动初期就存在的问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在核时代来到之前很久，就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在较早的时期，新西兰工党抛弃它原有的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渐进的不可避免性”（费边主义者曾经使用的术语）上面，寄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上面，寄托在“通过立法实现”社会主义上面。在这种过程中，除了在选举日拿铅笔写选票以外，人民群众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今天，在数届工党政府执政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实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企业、垄断资本一天比一天更加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工业方面，在旧“赤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一三年衰落以后，劳工运动接受了劳资调解和仲裁就是前进的道路这种观念。他们指望资产阶级的国家能“公平对待”工人。归根结蒂，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唯一的真正的武器——不付出劳动力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当时被多数人抛弃了。

历史正在证明，这种态度是多么错误。工人们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在对付垄断资本时，都不得不使用他们最后的武器。我们发现，已故的劳工联合会主席芬·帕·华尔希先



生在去世以前曾說：

“事态发展的趋势已經证明工党领导人諾德迈耶先生在上次劳工联合会大会上所說的那番話是不真实的。他当时說阶级斗争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今天我們沒有阶级，事实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同大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你对此加以思考，你就会发现，我們对于新西兰当前这些问题的态度，同我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爭論问题的看法是以同样的原則为依据的。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了解这两者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即使你觉得馬克思主义的名詞有些麻煩，也要記住馬克思主义是一門科学，它同其他各門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專門術語。还要記住这本小册子不仅是給新西兰人看的，它在国际上的发行量也会相当大。所以有許多問題必須比只在本地发行的书刊解释得更充分一些。

如果記住了这些，那么，我們相信，考虑一下新西兰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观点，就会在你的脑海中不仅消除资产阶级宣传的謊言，而且也会消除那些应该更为有腦子的朋友們的謊言。这会帮助你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发展新西兰日益壮大的阶级斗争，使你明白在新西兰的政治战綫和劳工斗争战綫上的原則和策略。

### 我們曾到莫斯科去会談

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新西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去就意識形态分歧問題举行兄弟般的会談。这个代表团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請前往的；这个代表团的成員包括团长、总書記維·乔·威尔科克斯和团员、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政治委员会委員阿·奥斯特勒和政治委员会委員迪·沃尔夫。

你們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广播电台和报纸上曾經报道过。从那以后，許多非党的朋友曾經問道：“你們当时到莫斯科去究竟要談些什么？”我們想在这有限的篇幅內，像我們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們說明的那样，尽可能清楚和确切地闡明我們的立場。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扼要地說明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我們为什么会被邀請。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們在听取了作为兄弟党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党的乔·杰克逊所作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就作出了某些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是根据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进行情况的报告作出的，而且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年中以来我們所了解的一系列事件作出的。一九六〇年年中，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杰·滿生曾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出席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他发现自己是在出席一次匆匆忙忙召集的世界各国党的代表會議——这是在其他許多党事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由苏共领导召集的。在这次



會議上有人企图造成对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政策的全面譴責。杰·滿生明智而正确地拒絕表明新西兰党的态度，他說，他的党沒有授权給他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来的目的純粹是参加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

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談的时候就指出，苏共领导事先沒有經過应有的集体討論就这样专断地单方面采取行动，企图使自己的意見得到贊同，是多么錯誤。苏共中央書記米·安·苏斯洛夫說：

“首先，讓我們談談你提出的关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問題。威尔科克斯同志，难道你不知道，召开那次會議的原因是中共领导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起了公开的进攻嗎？难道你不知道，早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北京就出版了一本冠冕堂皇的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仅由中国领导方面而且由形形色色的叛徒在全世界各地广为散发嗎？”

他們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为那官僚式的行徑辯护。然而，《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当时正被許多党作为党的学习材料。至于知道在羅馬尼亚代表大会之后将举行一次世界會議的問題，我們要向米·安·苏斯洛夫指出，当时許多党沒有派代表到布加勒斯特去——他們不知道——还有許多党沒有他們的中央领导核心出席，而如果要开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會議，他們的出席是必要的。在塔斯曼海对岸的我們的兄弟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根本沒有代表出席。事实上，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事后才非常感激地得到了我党代表杰·滿生的报告。

因此，看来当时許多人都不知道議程上有举行世界各国党代表會議这一項。

正是这类事情促使新西兰共产党领导对苏共领导的許多做法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疑問，最后并对他們的許多“新的”理論和实践同样也进行了批判的研究。

自然，这个問題在布加勒斯特並沒有解决。这样一次匆匆忙忙召开的會議是解决不了这个問題的。因而，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正当地組織起来的世界各国党的會議，新西兰党正式派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

但是，在苏共負責組織的这次會議上，我們也对苏共所采取的程序感到不滿。在这次會議上，正確地向所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文件草案，这个草案經過修改以后就成为由出席會議的所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簽署的八十一党声明。但是在会上也散发了苏联领导在布加勒斯特的声明。这是这次會議的正式文件之一。但是，中国党的答复却没有散发，而不得不从中国代表們那里取得。由于这种做法，出席會議的許多党的领导人甚至沒有看到这个文件，更談不上研究这个文件了。苏共答复中共的另一个声明也散发給全体与会者。但是，中国的答复却又沒有散发。

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客观地研究一切能够得到的事实和意見。但是並沒有这样作。



更恶劣的是，当时（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苏共提供的材料中談到的关于从中国撤走技术人员甚至撤销工业企业以及削减“援助”（注：一切物质“援助”都必须在以后付款）的原因，同苏联最近的材料——以及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们代表团說明的原因完全不同！苏斯洛夫对我们代表团說，中国领导拒絕接受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但是，他所指的是一九六一年的事情——在中国已經有过以前这次經驗之后的事情。

我們不禁要为这些做法感到不安。

然后，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从諸如免費供应面包（从一九六四年起）和废除所得税这样微小但是重要的措施着手的“二十年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我們曾經期望这个綱領将成为促进新西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一个重大因素。到今天，事实已經证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人們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突出的其他方面去了。资产阶级报刊对此热烈欢迎并且开始在把这个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埋葬掉。

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没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来闡明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指望所有的代表都来譴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我們的代表将这些情况向我们党汇报之后，我們拒絕这样作，并要求召开另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

我們当时就认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开會議上，公然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猛烈的攻击，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們认为，这不仅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感到高兴，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散布混乱，而且直接违反我們世界各国党关于应当如何处理我們运动中的分歧的决定。

我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沒有談到阿尔巴尼亚党的立場的是非曲直問題。他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在我們世界运动的內部来为自己讲话。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們有这种权利。

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已經公开攻击了苏共领导，继而引用諸如《苏格兰人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妄加猜测的文章来为自己辯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妄加猜测的文章是一回事，资产阶级利用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党进行的公开譴責所发动的宣传攻击，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我們队伍之外的所有的人和我們队伍之內的許多人的心目中，这些攻击成了人們注意的唯一的問題。而苏共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完全被人忘記了。

（的确，从現在已經公开的有關苏联的农业和工业的問題中，可能产生这样的疑問：整个概念是否提出得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问题已超出了这本小册子的論述范围。）

要求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兄弟党的代表譴責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的那种



做法是錯誤的，当时这些代表沒有被授权这样做。这样一件世界范围的事，只能由一次世界性的會議来决定。我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违反我們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世界性的決議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是怎么說的呢？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說：“會議参加者交換意見以后，得出了結論，认为在現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員的双边會談和相互交換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以便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協議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說：“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們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負責，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負責。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會議来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通过协商途徑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爭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問題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會談和协商。”

这些做到了沒有呢？我們說，沒有。的确，他們也曾經作过一些嘗試要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举行會談。但是，他們有沒有根据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这个精神来作呢？

而实际上在这以后出現了怎样的情况呢？赫魯曉夫代表苏共领导集体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話，而且从那时以来一再地重复这些話：

“如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珍視本国人民的利益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如果他們真正希望同苏共、同所有兄弟党友好，他們就应当放弃自己的錯誤观点，回到在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中团结和密切合作的道路上来，回到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上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的：在举行双边性质的會談以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必须声明，自己在一切有爭論的問題上都是錯誤的。在这里，苏共的态度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任何这种观念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既然話全說了，事情都做了，那么，按照苏共领导人自己的說法——姑且不論这种說法是对还是錯——在他們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理論和实践上的立場也正是十年或者十五年前苏联的立場。





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说，在斯大林时期，从三十年代起，布尔什维克党已经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了呢？

再来谈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苏共中央在给我们党的信中和在其他许多场合都曾经说：全世界各国党都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搞分裂活动的，等等。事实决不是这样。所有各国党并不是个个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我们并不想在这些问题上使你们生厌，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事实是，一切经验都表明，错误的实践是从不正确的理论中产生的，而且事实上它是以不正确的理论为根据的。

苏共领导人和其他党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大量的断言，使我们严重忧虑；我们认为，这些话不是以事实作根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永远从事实出发，必须从已知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某人想望的情况出发。社会民主党人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而采取后一种做法，但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态度。我们来引述一段话：——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他们同苏共、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尖锐化到极点，——”（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不错，对于中国领导人及其所做的事，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说“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不正确了。这是不确实的。人们说话如果离开了已知的事实——不论他们多么不喜欢这种事实——他们就开始踏上了危险的道路。

我们作为一个党，是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为依据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件仍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党也没有任何权利来改变其方向或重点。只有通过我们世界运动的集体决定才能这样作。看来有许多党在独自修改这些文件，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些片段来适应他们自己的想法，使文件遭到歪曲。

我们认为，这样做的党当中包括苏共。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我们党的政治委员会才决定，不能照着其他一些党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使下所做的那样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相反，我们要求为再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作准备，以便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决定来考虑全部有争论的问题。宣言和声明中的有关部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述过了。我们建议，应当由最直接有关的方面举行双边会谈，以便为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创造适当的气氛，一种不会导致主观的攻击而会对一切问题作客观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估计的气氛。

因此，我们写了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連串的信接踵而來。中國黨同意我們的意見，他們自己也提出了有些相似的建議。後來，蘇共中央委員會建議需要召開一次世界性會議，但是出發點是他們的意識形態絲毫不成問題，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更有效地把他們的意識形態付諸實踐。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當時對於同蘇共領導舉行會議是否能取得任何有價值的成果仍然表示懷疑。

當蘇共中央終於發出邀請要新西蘭共產黨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討論分歧的時候，情況就是如此。這個建議恰好是在新西蘭共產黨一九六三年復活節舉行代表大會之前來到的。

同時，新西蘭共產黨領導對我們世界運動的形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嚴重性進行了很多思考，這種分歧在各方面的活動中也像在理論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上一樣變得日益明顯了。

我們得出了我們的結論，這個結論不是通過別人教我們怎樣考慮問題而得出的，而是通過我們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鬥爭經驗、通過我們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而得出的。

我們斷定（這種看法得到了我們黨上次代表大會的批准）：蘇共領導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已表明，他們基本上已經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站到修正主義的立場上；如果不加以糾正，就會導致完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他們也像從前的修正主義者一樣還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

這個判斷並不是輕易或愉快地作出來的。這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經過了一些痛心的時刻才作出來的，因為我們多少年來一直忠誠於蘇共領導，這種忠誠差不多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這不是反蘇立場。蘇聯人民和他們的共產黨必定會向共產主義前進，但是在尼·謝·赫魯曉夫的領導下，修正主義的滋長若得不到糾正就會起很大的阻礙作用。的確，在全世界範圍內，這種修正主義的影響已經很嚴重，起了阻礙作用，這是由於蘇共對各國黨有着特別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追溯到列寧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時代。

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據我們了解，在蘇聯還沒有發表過，但是《紐約時報》在一九五六年非常迅速地在特別增刊上發表了）儘管不公平，它本來應當把人們認為蘇共領導不會犯錯誤的觀念永遠打消掉了。從某些人今天的態度和言論看來，人們很可以問一問：“打消了沒有？”當然，任何相信哪個黨或者哪個領導人不會犯錯誤的觀念都是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道地的唯心論——但是這種觀念還是存在着。

我們再說一遍：像我們目前這樣在意識形態上同蘇共領導持不同的意見，並沒有改變我們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對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和成就的尊敬和熱愛。

### 我們的觀點的基礎

除了對待兄弟黨關係方面採取的工作方法和組織方法問題外，我們在哪些問題上有不同



的意見呢？我們有不同意見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天天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的。

在今天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些字眼經常不斷地出現。一些黨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制訂它們的政策，即：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勝利和帝國主義衰落的新時代——這樣一個時代事實上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變得過時了，或者不再像過去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是決定性的因素了。

這特別適用於對待如下一些重大問題的原則上和策略上的態度，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法。

——國家的性質。

——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

——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它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立場（以前大家都認為這是危險的修正主義傾向的例子，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到底）。

——社會民主主義。

這些分歧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因此，客觀地研究這些分歧就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客觀的研究，是為了澄清是非，在意識形態一致的原則基礎上達到團結。這種意識形態的一致則是通過以正確的辯證觀點來研究一切有關的已知因素而取得的。如果認為，給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人們簡單地扣上“教條主義者”的帽子就解決一切爭論了，那是無益的。基本的重要出發點是讓所有的人都認識到：沒有任何領導人、沒有任何黨能夠說，他們在一切事情上和一切方面都永遠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同蘇聯同志們會談的時候，就認為在他們的態度中內在地存有這種觀念。

當然，在這些深奧的理論問題上，我們黨並不認為我們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出席莫斯科雙邊會談的代表團，我們的政治委員會和我們的全國委員會，在重新考慮這整個問題的時候，更加相信在那些極端重要的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是正確的。否則，就不會發行這本小冊子了。

我們黨過去完全贊成，現在仍然贊成當時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通過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我們黨過去完全贊成，現在仍然贊成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結束時全體簽署和發表的聲明中再次作出的同樣的決定。那項重要的意識形態的決定是：修正主義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我們還毫不猶豫地說，事態發展證明，這個觀點不僅是正確的，而且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這個危險還大大地增長了。

列寧在世的時候是怎樣談論修正主義的呢？（我們要記住，列寧曾以他畢生大部分精力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隊伍中以及當時組織良好的第二國際的各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的滋長進



行斗争。)关于修正主义,伟大的列宁說: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我們认为,目前以尼·謝·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經站在这样的立場上。这样的形势势必深刻地影响其他許多党,并且把它們导向修正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是出乎意料的。我們再說一遍,由于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列宁的党”就有着广泛的影响,苏联党現在仍有极高的威信。

我們今天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真理正在被篡改,或者被认为是过时了,我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情况毫无必要地給阶级敌人增加了力量。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肯定地导致公开的背叛,一如考茨基<sup>①</sup>的修正主义在列宁时代所做过的那样。因此,新西兰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这种原則的立場。

我們和八十一党声明一样,也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但是今天教条主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一些党的领导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尼·謝·赫魯曉夫等人所說的一切,他們不让他們的党员知道或有机会閱讀和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見。不幸,在一些党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們党的领导已經尽我們的組織力量所及,向党员們介紹了各种观点。例如,我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一份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双边会談上的发言、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全文以及我党总书记維·乔·威尔科克斯在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向全国委员会會議所作的报告。

在認識到教条主义的危險的同时,我們还不安地看到苏共领导不再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險了。米·安·苏斯洛夫說,“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許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們显然认为,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問題上,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再是正确的了。从下述的引語中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讲的話的意思,

“苏共过去和現在都既同修正主义也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有些人却只片面地強調同修正主义斗争,而且有时还把创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修正主义’,从而給共产主义运动制造明显的混乱。……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問題的解决,是最严重的錯誤的根源。”

——《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編輯部文章

<sup>①</sup> 他是二十世紀初德国一个居重要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努力,咒罵俄国革命,墮落到全面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場。与此同时,他却仍然高喊他的新理論是馬克思主义,而馬克思自己早先的論点則已經过时。



“在目前情况下，‘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鲍·尼·波诺马廖夫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三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盟警告说，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最近时期的事件发展表明了这些结论的远见性。……左倾机会主义……在目前其危险并不小于修正主义。”

——《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社论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苏共过去进行了、今后仍将进行反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坚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论点，这些论点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声明正确地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同时也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

“我们党本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利益，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

——引自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如果从这些引语来看，他们的态度还显得有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只能提醒你们读一下列宁所讲过的关于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话。（见本刊第十页）

总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八十一党声明是这样说的：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今后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请客观地把这一段话同引自《真理报》社论的那段话或上述其他引语比较一下吧。

我们认为这是危险地改变了着重点。这样做，鼓舞了各地的修正主义者，鼓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并且，一般地说，还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分裂。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谁要指出修正主义的倾向或者真实的理论根据，立即就被攻击为“教条主义”。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是根据“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是今天主要危险这种臆想行事的。

我们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持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已经说明了。无论如何，这种臆想，或者说这种观点，无论在字句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提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清楚地说明主要危险在哪里。有些人企图为这种方向上的改变辩解，说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新时代里所产生的一些新因素改变了形势，这种辩



解是毫无道理的。

自从一九六〇年我們經過長時間集体討論后通过決議以來，沒有出現新的主要因素。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明確指出我們生活的時代的性質，並且概述了我們運動前進的一般道路。新西蘭共產黨在言行中堅持遵守這一點，並且期望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也這樣做。

這種改變意味着什麼呢？逐步放鬆對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打擊，終將導致什麼呢？我們認為，自從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以來的這几年中，蘇共領導一直在發生這種改變。這種趨勢不僅導致錯誤地過分強調我們的世界運動中的教條主義危險，把每一個批評都誇大為教條主義傾向，實際情況比這更惡劣。這種趨勢不可避免地導致修正主義思想的滋長和接受這種思想。這種趨勢，從一九五六年不公正地批判斯大林，相當快地發展到把斯大林貶得“一文不值”，抹煞他的積極成就，硬說蘇聯在斯大林執政時期雖然建設社會主義，卻實行了“舉世未聞的最殘酷的和血腥的專政”。

難道不正是在蘇共二十大進行的這種攻擊——我們已經說過它是不公正的——大大幫助了當時新西蘭共產黨內已經存在的修正主義的司各脫小宗派嗎？在他們不僅攻擊黨的政策和領導，而且攻擊關於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的公認的基本原則——黨的章程和規則——的時候，《紐約時報》刊印的那個秘密報告不是成了他們的“聖經”嗎？

不論斯大林犯過什麼錯誤，他不是修正主義者。因此，現代修正主義者在他逝世後同他發生誓不兩立的衝突。“個人迷信”變成了一切麻煩、一切失敗的根源——不僅是蘇聯國內農業或其他方面失敗的根源，而且是一切地方一切錯誤和一切困難的根源。這一直是近年來圍繞所謂“個人迷信”問題而採取的態度，儘管事實上斯大林逝世越來越久遠了！這種態度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但是由於這種態度是從一個捏造的前提出發的，因此它會導致進一步的失敗和挫折。占主導地位的是歇斯底里，而不是辯證的、客觀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樣就為修正主義的得勢大開方便之門。

如果各共產黨之間在某些理論問題方面產生了分歧（當然這種分歧會不時產生），那麼顯然要責怪中國人，因為他們奉行“對毛的迷信”。對朝鮮黨及其領導人也進行了類似的指責，同時還對其他的人進行影射。對爭論中的那些問題並沒有認真地加以考慮。占上風的是主觀，而不是客觀。

### 什麼構成修正主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具體的重要方面，看看蘇聯共產黨和一些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今天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對於這些方面是怎樣說的和怎樣做的。我們盡量說得簡短一些。



关于领导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担心，即：今天在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对世界总的看法中，有人过多地强调了并不存在和平可能性的地区的和平可能性，而对其他方法则强调得不够。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说今天在存在着从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国家里有一种明确的起阻挠作用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影响到处侵袭我们各国党的革命核心，为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的渗入开辟道路。

其次，我们还认为，有人过多地强调和信赖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物质进展对各国人民思想的影响，而对促成进步的真正核心，即资本主义地区、殖民地地区和新解放地区的群众积极性，则强调得不够。

在我们看来，进步的基础仍然是阶级斗争，非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战斗。我们同意，社会主义的胜利，苏共纲领的胜利实现等等是重要的，并且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难道不应当把它们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吗？

我们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中英勇和胜利的红军曾经到达或者迫近因而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的地区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和平过渡的第一个先例。然而我们知道，一些党实际上已经得出，或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和平的道路。

对于这种严重的修正主义发展，我们认为目前的苏共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概念一直在发展和扩大，直到造成了上述局面。就我们所知，苏共没有对这种发展提出过任何认真的批评，而最近却不断地对认为和平过渡在大部分非社会主义世界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想法进行正面的攻击。

的确，认为我们非社会主义世界所有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骑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背上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受到了鼓励，从而损害了依靠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说明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简短地引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纲领中的一段话。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们赞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是通过同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途径，而是用更完善的社会组织的范例，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通过为人们幸福安宁的生活制造一切条件，来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心灵的。”

如果这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有耐心，我们就可以袖手不动，因为主要因素将是阶级战斗已经获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能赢得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群众的思想与心灵呢？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到那里去了呢？

我们认为，这样过分强调一个方面，可能是很危险的，并且可以导致错误的结论。但是，



我們同时要着重指出，我們并不低估一九一七年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为重大的影响；也不低估从那时以来苏共领导、党员和苏联人民这些年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以及他們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作出的牺牲。

苏联的一位主要理論家波諾馬廖夫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紀念列宁誕辰九十三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說：

“列宁主义把和平共处政策同进一步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结合起来。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强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保卫和平与在世界政治中维护和平共处的原則，根本不会削弱世界革命的进程，只会加速这个进程。正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从而继欧亚两洲之后，社会主义在世界第三大洲——美洲获得了一个据点。”

在某种程度上我們同意。但是古巴革命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古巴人民的武装斗争赢得胜利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嗎？（附带說一句，我們了解，不幸的是，这场斗争既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领导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支持。）在我們前面引用的一段話中所強調的，是和平共处的条件，而没有提及起作用的有效因素——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是每个国家内的根本因素，在这种观点中看不到这个因素。

在我們党看来，在每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总是希望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上，必须为非和平过渡作充分准备。这样，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而对革命采取武装镇压，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就能狠狠地予以还击。坦白地说，我們认为，指望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而自願赞同的和平过渡，这将不可避免地要挂伤人民的革命意志和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我們认为，以为统治阶级会自动交出政权的幻想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問題，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說的呢？我們簡短地摘引几段：

“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它們所面临的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提供新的可能性。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們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鋒队認識到，他們自己肩負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資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們将在本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生活的一





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创造着条件。”

一九六〇年的声明把事情说得恰如其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根据本国的条件肩负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担。声明如实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所起的辅助作用。声明没有修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群众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是在本国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米·安·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对我们的代表团说过，苏联共产党主张根据当地的条件采取一切过渡的方式。别的人也的确多次谈到过这一点。但是，事实仍然是，一九六〇年的大争论是关于应该比一九五七年宣言更多地还是更少地强调和平的过渡方式问题。主张更多地强调这一点的观点，是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尼·谢·赫鲁晓夫带头提出的。意味深长的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党会议声明的初稿，只谈到一种方式，即和平方式。别的党不得不进行斗争来把它修改成后来的样子。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态度提出疑问。

其次，我们感到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条件的变化，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中心不可避免地已经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的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难道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风暴的中心吗？

这里，我们想从列宁的报告中摘录几句话，虽然不是直接适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当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

“今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在我们世界运动中提出来关于资本家将和平地投降——不仅是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而作出让步，而是面对着议会的多数或者其他保证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和平组织机构交出国家政权——的总的概念，简直不适用于今天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它是否适用于别的地方，对这一点我们也表示怀疑。这个概念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要末是接受这种概念，而使有效的斗争开展不起来，因为整个状况要求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要末是这些国家的同志反对一九五



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在许多国家里正在发生后面这种情况。

老实说，我们觉得，在当代世界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往往是更多地由被认为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国家政策、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来决定的。这一切的背后似乎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它们需要同帝国主义长期保持和平的关系，因此“不要去刺激野兽”。建议在某些尚未攻克的重要帝国主义堡垒里准备和进行武装斗争，那是非常“刺激人的”。因此，我们在听到有人大谈什么“明智的帝国主义者”正被说服接受和平投降的同时，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却在继续采取一成不变的强硬路线（很难说服越南南方人民相信帝国主义正在变得明智了！）。

这种理论家是不是始终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仍然各不相同，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呢？在新西兰，武装斗争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必须运用其他的斗争形式。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任何其他的人都应该运用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也决不能单凭我们自己的处境来作出判断。

在新西兰工人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总目标，在反对垄断资本、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和各种形式的日常的經濟和政治斗争中，给予积极的领导。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希望实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时时刻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或者甚至是很可能的道路。我们党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高革命觉悟上，同时它本身必须为非和平的过渡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随着条件的发展，当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成为新西兰的一个迫切问题时，如果统治阶级拒绝接受人民的意志并对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话，我们党就将随时狠狠地予以回击。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陷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得到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欣然赞同的和平过渡上的那种境地，那么它就将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早期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当年大卖力气干的那样。我们认为，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重新研究一下那个时期。因为，难道不正是那些修正主义理论家，在世界规模上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造成分裂，结果才成立了第三国际？我们极其严肃地提出这一建议，因为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我们正面对着世界规模的分裂。我们希望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并避免这样的发展。

但是苏共中央的代表们就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把他们的話引述如下：

“我们完全不同意你们的如下论点：社会主义革命的風暴中心（如你们所称的）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南美。这不仅是对莫斯科各次会议文件的重新估价，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可能性缺乏信心的表现，是对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权缺乏信心的表现。如果風暴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么，工人阶级



的历史作用在哪里呢？作为工人阶级的产物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又在哪里呢？我要重说一遍，你们的论点完全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愿意提醒你们看看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是怎么说的。我们时代的中心因素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些因素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两个对立的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进行斗争的领域，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战场。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则是我们时代最巨大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你们要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呢？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决不会贬低你们所提到的那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是有助于了解那场斗争及其前景的真实情况。

“对我们时代的特点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使你们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修正。”

这确实是重要的谈话。我们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了。然而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

“同志们，我们重说一遍，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认为有人未能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风暴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在一九一七年，风暴中心是在俄国和欧洲。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难道风暴中心不是在亚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吗？”

同时也让我们指出，尼·谢·赫鲁晓夫本人讲过这样的话：

“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给予帝国主义以日益沉重的打击，有助于加强和平和加速人类的社会进步。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中心。”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第十五届

联大进行一般辩论时发表的讲话

我们只好让苏斯洛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他们自己去争个明白了。我们坚持我们所提出的主张。人们所注意的是薄弱环节，而今天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这些薄弱环节正是我们所指出的那些地方。我们并没有背离我们世界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并不否定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堡垒里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苏联党领导人的最近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找到许多这种普遍的混乱和矛盾。我们要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们的下述看法是正确的。我们的看法是：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不再是把他们的观点坚定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而是虽然有时也满口革命词句，实际上却已让某些危险的修正主义思想渗透进去了。

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势必首先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实现的陈旧



思想。历史证明，进展是出现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上。在一九一七年，当时的许多修正主义者反对俄国革命，其理由是：由于“沙皇俄国的落后状态”，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们借口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突破的“资本主义的优点”上，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的苏联同志们应当仔细地看看这一方面，而不要指责别人背离了总路线。

社会主义世界的巨大进展及其普遍影响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应当指望资本主义世界较薄弱的地区正在战斗和组织起来的人们，并且向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我们应当，并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丝毫不会削弱主要工业国家的斗争。这两者是携手并进的。

谁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修正主义者。

### 怎样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今天，各国党都说它们同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关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策略主张的提法，这是就我们的党的活动来说的。大家都同意，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广大阶层的群众开展有效的斗争，即使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世界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争取和平的斗争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它涉及哪些问题时，分歧就开始产生了。

我们认为，这些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些人没有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将采用各种方法，千百万人将被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他们当时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为了争取和平，而且是针对着帝国主义的。

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不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只局限于某些方面，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重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全面斗争，其中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的和平共处政策；包括吸引帝国主义世界的群众——通过他们的工会和政治团体，并且通过新的形式——参加有组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包括自然而然地扩大到殖民地和解放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和平运动。

但是是否应该到此为止呢？有些人似乎是这样想的。我们怀疑，依靠群众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斗争的重要基础；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把他们吸引进来这一点是否还被看成是进行有效斗争的目标。这个运动似乎往往依靠吸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参加并依靠他们来领导，它的组织也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当然，他们可以起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次要的，而



不是主要的；同样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間就有关和平的各种問題所达成的協議是有价值的，但是与群众对于爭取和平的觉悟的提高，从而意識到必須采取有組織的行动这种情况相比，却是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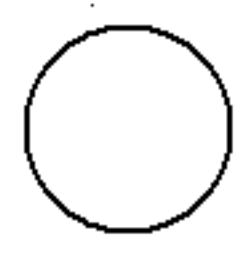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随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大会的报告，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上述做法上的缺陷是一清二楚的。根据我們的观点，更糟糕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爭取世界和平斗争重要組成部分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是被忽視了就是遭到反对。但是我們要說，这是爭取世界和平斗争的重要部分。

我們认为，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如我們在前面說过的——是由于沒有能够認識到，实质上，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在一切战綫上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沒有能够認識到，在我們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沒有能够認識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

真正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者是沒有的。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我們要問，帝国主义头子有时候不是錯誤地被划为这一类人么？例如，艾森豪威尔曾被赫魯曉夫称为“爱好和平的人”。此后，对于肯尼迪也說了些类似的話，毫無疑問，这种話不久也将应用到約翰遜身上。

在这里，我們必須說，我們认为，今天我們的世界运动在这个和其他重要方面的某些分歧，是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的那些概念所产生的；后来許多人把这些概念这样地加以发展，以致當我們估計我們新时代的时候，我們不禁要問，着重点是不是有点紊乱了。这种“新”是真的新呢，还是一种新形式的修正主义？指責我們提出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那种說法是正确的嗎？还是只不过是掩盖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真正严重的倒退行为的外衣？

因此我們要問，我們所說的和平共处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它有变成各人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东西的危險。我們要問，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实行和平共处的时候和地方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其本身就意味着可靠的世界和平，这种想法是不是不正确？我們援引一两段苏联的言論來說明使我們担心的是什么。



“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間的暫时的、不稳定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弃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的基础上。”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在当前条件下，已經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爭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問題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它们的外政策总路线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作为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所宣布的口号的实际表现；争取和平的行动是各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鲍·尼·波诺马廖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座谈会文章：《革命运动中的若干问题》

“和平共处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或某种暂时的、靠不住的休战。它首先是相互拒绝使用武装部队作为解决国与国间争端的手段。”

——多列士在一九六二年《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座谈会文章：《伟大革命变革的时代》

（把多列士的言论也列在里面是为了表明和平共处的概念是多么各种各样。）

上面这些引语都不是罕见的。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的话来说明，关于所说的那种和平共处，究竟我们是已经获得了呢，还是在获得的过程中；是意味着持久性质的和平呢，还是不是持久性质的和平等等，是不明确的。

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不明确？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说得很清楚。我们引述如下：

“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

“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问题的核心难道不是这个事实，即和平共处为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群众作为争取和平的一支力量而发生作用，为发展阶级斗争和为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创造有利条件吗？

列宁是否曾经从“相互”的意思考虑问题呢？我们认为，列宁的概念是，共产党人必须努力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但是他有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依然继续存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依然继续存在？在我们看来，列宁认为，不能忽视这些矛盾，同时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利用这些矛盾来随时随地促进革命斗争。尽管社会主义世界发展壮大，列宁看到的那些矛盾仍然存在着并且起着作用。至于我们引述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所谈关于和平共处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往往被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吗？难道不是存在着这种幻想，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重要因素，是同帝国主义政府达成协议而不是在各地把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吗？我们认为这种幻想是存在的。



我們的意見是：和平共处的概念决不能在实际上变成压制殖民地和資本主义世界革命力量的政策，唯恐这种革命力量会扰乱同帝国主义关系上所希望的“平靜”时期。因为，这样一来，人們就开始走上投降的道路，并利用修正主义的論点来为他們改变了的态度辯解。

我們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會議作出的決議中的如下論点：

“帝国主义陣营日益疯狂地从事軍备竞赛、奉行欺騙人民的政策、侵略和国际挑衅的政策，用这些办法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

的确是这样。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軍备的力量；核武器仍然存在；在越南南方，某种程度上在老撾、朝鮮和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挑衅行动和战争。在我們談論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战争的世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正視这些事实。事实是：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帝国主义連同它目前那样为非作歹的力量都不再存在的世界。

也許再引述一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会有助于人們正确地看待事物：——

“苏联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強国。中国将成为強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取得新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将完全崩潰。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絕对的优势。

“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实际上，今天，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內的某些共产党的政策，难道不是建立在认为上述一切已經实现——虽然帝国主义肯定不承认这一点——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嗎？就和平共处的正确政策來說，我們认为，必須使我們的脚跟站在稳固的基础上。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国家政策的基础。我們也同意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但是讓我們把列宁的著作牢記在心。讓我們記住，社会主义体系生产的工业品还没有占世界工业品的一半以上，殖民主义体系还没有最后崩潰，而新殖民主义却在一天天滋长。

就我們的世界范围的运动而論，就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际上奉行的政策而論，如果我們不記住这些，那么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一种政策就会导向冒险主义的行动和不可避免的退却。

这里，我們认为我們必須提一下近来使新西兰党深感不安的、同苏联政府政策有关的一些事情。前些时候我們听到許多关于“戴維营精神”的談論，虽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領導人和社会主义領導人之間根本不能有什么精神上的一致。我們并不是說有时进行最高級談判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当时，对那次談判的提法，可能在群众中造成这样的幻想，以为是“領導人”而



不是人民能够得出结果和实现持久和平。这样的事情涣散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斗志，特别是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在新西兰，工党政客一直在鼓励劳动人民让领导去包办一切。

还有，不久以前，我们相信而且鼓励大家相信：苏联的政策意味着他们决不会第一个恢复核试验。突然，像个晴天霹靂，他们宣布他们将重新开始一系列核试验。当时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并表示同意，然而新西兰的一般工人却不能理解。由于苏联政府没有预先说明被迫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从而大大损害了和平运动。大多数工人终于说：苏联和美国——“让你们两家去遭殃吧”。这是事实。

人们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这个事实，即法国正在进行试验。我们党支持这种论点，但是现在，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之后，对于法国不久将用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先进的武器在南太平洋进行试验一事，又能指望我们说些什么呢？对新西兰人民来说，这种试验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它就在我们的后院进行。然而，实际上，它所表明的重要的事情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在使我们免受继续存在的核战争威胁方面，而且甚至在使我们免受大气层试验的威胁方面，都是完全无效的。难道指望我们说，法帝国主义是新西兰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避而不谈原子毁灭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吗？我们会走向何处呢？

在古巴，曾经否认建立了导弹基地，可是突然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导弹基地已经建立了，并且是必要的。难道指望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巧辩过去吗？在苏联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概念加以责难之后，我们知道有人就在帝国主义战术上最强大的地方把导弹基地建立起来。自然，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把导弹基地撤除，可是当时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和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起初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到那里去呢？——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听说，苏联反正可以从自己的国境稳稳地击中美国的要害。

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许可以说，关于今天帝国主义的处境，我们同意它是“垂死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和“泥足巨人”。换句话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是虚弱的，虽然从战术上来说，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古巴和导弹问题上，它可能是很强大的。因此，从战术上来说，必须根据当前斗争的情况和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当退却是不可避免时，为什么硬要去攻打坚强的据点呢？

现在谈谈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苏联政府曾多少次约定了同东德签订和约的日期——可是每次都没有下文。有时候看来签订条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又好像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很严重的，因为现在一般人（至少在我们国家的一般人）并不相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苏联政府今天是说话算数的。信任已经丧失了。在过去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不管人们的政治见解如





何，他們知道苏联說話算数，說到做到。在資本主义世界里，現在只有信念坚定的人还相信这一点，但是不可避免的趋向是：这种信念坚定的人将越来越少。

在世界形势沒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突然改变了政策，这种做法的最近一个例子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

事实是，現在被說成是和平事业的如此重大的胜利和标志着沒有武器或战争的世界的时代开始来临的这项条約，它同美国和英国在前些时候所提出的建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时苏联曾正确地拒絕了那个建議，认为那是一个企图掩盖帝国主义者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这一实际阴谋的騙局。

我們发表了苏联早些时候拒絕英美建議的消息。現在我們该怎么說呢？是参加大合唱，叫喊那是对和平的一大贡献，从而同他們和我們在先前說过的話自相矛盾嗎？

这里略引苏联领导过去就帝国主义关于部分禁止核試驗問題的建議所說过的一些話。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最高苏維埃第四次會議的报告中說：“我們想再次強調指出，苏联坚决主张：必須停止在空中、地上、地下和水中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試驗。如果仅仅通过一項只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試驗的決議，那么，这将会打破各国人民对彻底停止試驗的希望。”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尼·謝·赫魯曉夫在接見《紐約时报》評論員苏茲貝格時說，

“如果軍备竞赛繼續进行，軍事工业繼續全力生产越来越多的核武器，停止試驗有什么用？

“我要說，这有点等于欺騙輿論，使人們放松警惕。人們將以为已經为阻止战争做了一些工作，而实际上什么也沒有做，相反地，軍事机器將繼續全力开动。

“此外，肯尼迪和麦克米伦的建議一点沒有談到停止地下試驗爆炸和所謂的用于和平目的的爆炸……。

“因此，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提出的建議的目的不在于保证各国的安全，而在于追求宣传目的来把責任推給別人，同时自己却悄悄地繼續实行儲存热核武器和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老政策。我們不能同意这个。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局势，关心我們自己的安全。”

我們要問：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除非美帝国主义者現在可能认为他們儲存的不会因時間过久而变坏的核武器已經够多了！

这一切前进和后退，以及突然改变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我們必須寻找思想根源。而且，當我們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沒有遵循一种原則上稳定、策略上灵活的对待政策的坚定馬克思主义路綫。事实上，事情已变得如此捉摸不定，以致我們党不得不問問自己，它是否知道这一切將导致什么后果。我們要問：这是否同修正主义滲入总的观点和意識形态有很明显的关系？我們认为是有关系的。这一切肯定要



在世界工人运动的队伍和一切进步人士中间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 “核弹”有没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最重要的方面，即今天我们世界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

我们认为，前者是目标，而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堕落到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去；就永远不会正视现代武器发展的真正含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核武器等等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概念。这样我们就会说，由于“核弹”的出现，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根源不再是产生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

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开始说，已经发生的变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及其根源的基本学说过时了。这种说法同认为战争是由于个别人的一时的念头或者一些事件所引起并没有社会根源的唯心主义立场只有一步之差。照这样推论下去，我们就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否认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及其重要性。

这里，除了最近十年来苏联的外交政策突然反复改变之外，还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事态。一个是依靠群众作为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且认识到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帝斗争。另一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呢，还是反对核战争和争取和平？我们已经说清楚，我们认为，前者是目标，后者是主要的策略手段。

苏共中央的代表们是怎样回答我们代表团的呢？他们说：

“你们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问题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说：‘各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说，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们的讲话差得很远。你们贬低了争取和平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党声明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世界工人阶级，担负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责任。争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八十一党声明说，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贫困，以及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现时代使人类摆脱世界战争的惨祸。”

我们的态度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虽然我们毫不低估核战争的危险，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态度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认为放弃或者逐渐取消我们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会对防止核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有任何帮助。除非我们隐蔽到外层空间去，否则无法逃得那么远来使这种政策见效！



另一方面，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难道不是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有许多空子可钻吗？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运动的战略目标正在失去重要意义，而其他事情——事实上是当前行动的重要目标——却变得和主要目标一样重要了。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认为帝国主义者拥有核武器这一情况对革命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难道从长远来讲群众已经不再是强有力的因素了吗？从下面引述的《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我们要说明的问题：

“不能用老的尺度来对待现代战争。世界战争如果不能防止，立刻就会变成热核战争，会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和破坏大量物质财富，会使整个整个的国家遭到毁灭。那些不考虑现代战争的后果，对核武器估计不足，或干脆不去考虑它，而把它当作对人们来说是次要的东西的人，是犯了大错误。”

我们知道，核武器具有可怕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那将是一场大悲剧。我们这些在新西兰的人认为，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防止核战争，我们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任何行动。例如，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举行会议，来寻找途径和办法，不仅禁止一切核试验，而且销毁现在储存的核武器、撤除一切基地和停止制造一切核武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张，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反对我国政府支持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政策，我国政府曾说过，不管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对与不对”都予以支持。

我党政治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决议中所表达的我们的观点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种广泛的斗争，它包含着各种因素。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殖民地世界，在受到新殖民主义威胁的地区，在革命形势非常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在帝国主义世界本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这场斗争是以群众及其战斗组织为基础的。在同帝国主义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谈判中取得成果，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不能局限在反对核战争方面，但是我们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我们要求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这就是说，不仅禁止核试验，而且要禁止制造核武器和禁止储存核武器。这就是说，要销毁现在储存的核武器。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像某些共产党现在所说的那样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已经过时而必须修正呢？难道因为核武器的发展，我们就得采取根本上是和平主义的立场么？难道我们现在能说这些武器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能说现在由于核威胁，任何正义的战争都不能进行，因而就没有正义的战争这类事情了么？

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不是就将导致采取否定的态度而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自己的战争、革命的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再也不能进行了么？那末帝国主义只要以“投核弹”相威胁，我们就会



退却。

我們一旦抛弃了必須竭尽全力防止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开始认为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战争，那末，我們很快就会嫉視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开展，以及一切民族解放战争。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性质的概念已經过时的新理論，把这些事情从日程上一笔勾銷了。这正是那些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目前所力图做到的，虽然他們在实践中还不能完全把这一点付諸实施，而且将来也无法做到。

我們党正致力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禁止核武器和禁止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武器，但是我們沒有忽視，这必須經過革命斗争。我們記得，尽管帝国主义进行了“核讹詐”，而且就在帝国主义掌握的核弹的阴影下，通过武装斗争，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越南北方、社会主义的朝鲜北方和社会主义的古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另一方面來說，帝国主义在哪个地方容許过和平地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年在苏軍到达或者有压倒的影响的一些地方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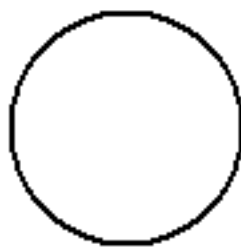
我們已經說过，今天在东南亚、南美、南非和許多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地方，存在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可能性——只要我們的运动不在帝国主义核讹詐的威胁面前屈服。

但是，一旦让帝国主义看出，如果他們用核弹来进行威胁，我們的运动就会从我們的革命斗争中退却，那末他們就会大规模地进行这种威胁。他們必然会采取这种策略，因此，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归根結蒂会把我們的运动引向什么地方去。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們的本性，是不会对别人发善心的，也不会諒解别人的恐惧的。事实上它們利用这种恐惧。他們也不会听取关于人类福利的議論。在我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在帝国主义沒落的时期里，在我們看来，最大的危险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全面退却。

我們也觉得奇怪的是，在关于帝国主义拥有核弹这一情况的种种新的談論中，社会主义世界也掌握了核弹这一事实似乎却被忽視了。幸而帝国主义倒沒有忽視这一点。阻止帝国主义“扔核弹”的这种威懾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保证帝国主义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敢搞核讹詐的强有力的因素。

我們认为，把核武器問題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动力是錯誤的。阶级斗争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核战争的前景多么可怕，阶级斗争并没有被消灭。我們运动的斗争决不能局限于促使帝国主义奉行和平政策、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要有可靠的和平，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請看，即使在要迫使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政策的时候，有些党在实际上也已經撇开了在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群众的作用。



讓我們再說一遍：我們運動的戰略目標是消滅壟斷資本，由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以此為起點建設社會主義；而我們時代的主要策略集中點則是防止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防止核戰爭。

### 本世紀最大的謊言

因此，我們要談談人們正確地稱之為“本世紀的謊言”的言論，那就是不斷地指責中國共產黨領導主張通過核戰爭在人类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代表團在莫斯科會堅定地說，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宣传，而且還有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在散布這種想法，從而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使有些工人得出社會主義的中國希望戰爭這樣的結論。許多人一向認為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希望戰爭，而現在他們不僅聽到帝國主義者說，而且還聽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希望戰爭的，從而播下了不團結和失望的種子。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者能夠讀一讀中國人自己究竟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講的。據我們了解，中國黨的領導在他們的綱領或政策中從未這樣講過。事實上，他們一向主張以對全世界群眾的信心為基礎的積極的和平政策。他們親自肯定地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說，他們不主張通過核戰爭實現共產主義。他們所說的只是，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這樣一次戰爭，並不是一切都完了，人類遭受嚴重的損失後，將會生存下來，社會主義終將勝利。事實上，一九六〇年八十一黨聲明講的和這一樣！

但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在莫斯科回答上述的話時，再一次地說：

“中國同志頑固地宣傳這樣一種思想：通過一次熱核戰爭，在帝國主義毀滅的廢墟上，世界人民將會創造更好一千倍的文明和建設一個真正美好的生活。他們所說的是：消滅帝國主義，而用不着管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毀滅；歸根結蒂戰爭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而且中國同志正企圖把我們的整個運動導向這個結論！他們懷着這樣的目的宣傳戰爭並不是那麼可怕。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在莫斯科提出過這樣的論點：如果人類毀滅一半，那也沒有什麼可怕，這將埋葬帝國主義。但是你們不想一想，所有的新西蘭人民可能在这一半人類里嗎？那末由誰來在你們的土地上創造美好的未來呢？問問你們的工人們，他們是否同意。”

中國人沒有講過這樣的話。我們知道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實際上是怎樣講的。我們黨的政治委員會委員阿·奧斯特勒當時作為新西蘭共產黨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世界共產黨會議。

為什麼總是歪曲地引述別人的話呢？肯定是一個人理虧的時候才歪曲地引述旁人的話。



这不是任何自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应当耽迷的一种习惯。

这給我們的世界运动造成极大的損害。

## 和平和民族解放斗争

我們坚持这一主张，即：对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各个方面，对于它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为使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进展鋪平道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須給予充分的考虑

对于我們这些在新西兰的人來說，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問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的門徑卷土重来的企图的失敗和东南亚从民族解放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为新西兰的进步打开了大門。这使我国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垄断資本的枷鎖，特别是摆脱美国政策的章魚般的控制，正是美国的政策使我們处于东南亚条約組織的最前綫，并且带来了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被卷入战争的危險。

我們已經指出，就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而言，我們认为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极关重要的作用沒有給以足够的注意。还有某些其他方面，特别是关系到最近苏共政策的一些方面，使我們深感不安。对于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和南美的傀儡政府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对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印度等国家里重新发展，或者对于过去一年中在伊拉克发生的更可悲的事件，沒有一个人能感到高兴。

在我們看来，下述引語似乎概括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般态度，这些引語虽然很长，但却說明問題：

“民族解放革命不是由于外界影响或压力引起的。它們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直接結果。但是任何这种革命要取得成功，有利的国际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結合新的和更为有利的国际局势来看过去十年中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它在这时已經形成——正在发展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步伐的主要因素。

“今天，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它的成員給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支持，是民族解放革命获得成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

“这絲毫也不会貶低殖民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人民没有表现出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沒有清楚地了解他們的最終目的，任何革命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大多数新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都較少，并且缺乏进行現代战争的手段和經驗。

“相反，它們的帝国主义敌手們却既有武器又有經驗。特别是它們有导彈，而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却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武器。



“虽然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一个年轻的国家的独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首先是苏联的支持，是保障独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苏联是唯一拥有制止任何侵略者的军事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每当帝国主义对这一或另一年轻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苏联的行动总能对它们起到使其神志清醒的影响——帝国主义者深知，苏联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的军事力量来制止侵略（然后举出了关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例子）。

“苏联的军事力量是如此显赫，以致有时只需要苏联政府发表一纸声明，便能促使西方国家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例如，当苏联政府说，它将支持印度把果阿、第乌和达曼从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西方关于要对印度进行制裁，包括进行军事制裁的一切谈论都马上消声匿迹了（作者说在西伊里安问题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军事力量来自经济力量。这着重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对所有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的价值。这是一个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纲领。这个纲领实现以后就会使苏联在经济上具有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

“这样一来，苏联便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归根结蒂将使帝国主义没有能力为推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政府而发动侵略。

“因此，成功地执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是符合一切争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利益的，也是符合这种解放运动的一切忠诚的战士的利益的。”

——引自一九六三年第二十六期《新时代》杂志所载尤里·

鲍奇卡廖夫的文章：《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

实际上，这篇文章无非是说，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有武器又有经验。至于如上面所引述的关于争取群众的“心灵”，使它们想望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又是苏联，又是它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威力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不是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在斗争中的群众。

我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它极容易不自觉地导致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采取了新的形式，但是其内容却仍然是可以感觉到的。

列宁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从他所著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一文中，引述如下的几段话：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纪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它们成了世界政治和用革命行动摧毁帝国主义事业中的积极因素，但欧美那批有教养的市侩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却顽固地无视这



一点。”

我們知道，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英勇努力，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发展了新武器。但是，我們不相信有任何事情能使得人民的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事实上，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方面，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却正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們对像老撾和越南这样一些斗争激烈的地区的局势也感到不满意。在南越，存在着把斗争推进到使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扩大社会主义世界——的可能性。把和平共处的政策运用到这种局势中来，是否意味着由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作出的一些官方的安排，社会主义在目前就必须局限在它現存的疆界之内呢？在研究了老撾等国家内的事态和人們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之后，我們认为实际上事情正变得非常接近于这种情况。

难道某些共产党不是往往把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好像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会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好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解放地区不起作用，而我們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现在就不存在了吗？

我們认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結果是为新殖民主义敞开大門。人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以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的态度来处理。列宁說：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

“第五、必須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組織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須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說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欺騙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們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国和弱小民族別无生路。”

是否曾經鼓励印度党去贯彻执行列宁的路綫呢？他們最近围绕“保卫祖国”这个口号所提出的概念使我們不能抱有这种看法。





让我们暂时先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我们注意到，有人经常说必须在解放了的落后国家里建立工业，以便有足够强大的无产阶级基础来把斗争推进到社会主义的斗争。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看，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是在提出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目前不能考虑在新的地区争取社会主义的新胜利。难道马克思主义在过去曾经提出过否定非工业国家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理论吗？这种进展现在主要正是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大概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北方。

今天，帝国主义正在提供“援助”方面同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就解放了的地区而言，它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例如在印度，美援正在迅速增加。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是真正的援助，帝国主义的援助只不过是為了掩飾将来的剥削的一种外衣，促使在印度和诸如安哥拉、莫三鼻给等一些非洲国家内的新殖民地化得到发展，并且越来越猖狂地试图在其他地方，如在印度尼西亚这样重要的国家里进行这种渗透。但是，要解决这种问题并不能依靠许多修正主义的新理论，而是要依靠列宁在下面的引语中所提出的办法：

“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只有通过这种做法，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前进的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会比较迅速地消除。

我们的代表团是否得到了任何有力的答复，可以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怀疑消除，使我们相信他们目前政策的基础是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答复是：没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我们的代表团是这样说的：

“首先，你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对立起来。你们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巨大的革命重要性，但是它不能在世界革命进程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指责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没有足够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对于这个指责，我们已经一再驳斥过从中国共产党口中听到的这个指责了。

“我们的党纲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纲领说，新解放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力量在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中的



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大因素。这个反映亿万人类的意志和力量的和平阵线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以及世界解放运动。

“你们谈到某些中心，东南亚和南美。你们痛心注意到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发展。我们有同感。

“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增长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直接有关的。高士同志在一九六〇年的会议上说过，‘……它助长了这个国家里的反共宣传，这种歇斯底里是被用来反对这个国家的——这里讲的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你们，中国领导在印—中冲突中的政策，表明它从和平共处原则——包括万隆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后退了。它对印度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之不得不面临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你们却硬说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危害了斗争中的人民。

“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给予了民族解放和反帝斗争以全面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斗争中所使用的是苏联武器。许多新解放的国家是用苏联的援助和武器来保卫自己对付帝国主义的。一旦需要，苏联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古巴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在东南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可能性就这样被忽视了，而且也没有客观地研究一下像印度这样的政府到底在多长时间內仍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政府。苏联领导人断言，印度是对的，而人民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侵略者。但是，亚洲或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说过，而其中大部分国家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侵略的迹象。

请原谅，我们想问一下，尽管他们说了那些漂亮话，就他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顺便提一下，苏共的代表们在同我们的代表团的会谈中，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到过新殖民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发现，这种事态发展很难同他们的公开的政策性言论相吻合。因为提到这种威胁会使人们再次同帝国主义正面对抗。

所有这一切导向何处？不仅导致我们的运动出现世界性分裂的危险，而且导致这样一种局面：今天再也没有人能谈论磐石般的社会主义世界并且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了。我们发现，有人对印度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印度本来就从来就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援助（附带说一句，我们的代表团在参加莫斯科双边会谈后回国途中曾在德里着陆，在那里的机场上我们看到一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就停在苏联提供的一架运兵和轰炸用的飞机旁边），但是却拒绝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任何援助。这些人谈论什么维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却拒绝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

是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唯一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



##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問題

争取比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縛的問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問題——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些人特別关心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们是采取根据长期經驗得出的看法——我們終生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尽管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無論在哪里，还没有任何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已經存在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地区的情况下，修正主义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問題的时候，意識形态問題是无关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包含广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有工人階級的群众基础，它不是资产階級政党。

（这也是今天如此公开地表現出来的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新爱情的基础。）

列宁曾經称新西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我国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当时的几届自由党—工党政府执行的政策中出現。所以，就这个問題而論，我們有过一段漫长的历史。

我們认为，我們当前所关心的是，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理論已經把馬克思和列宁所闡述的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經典理論当作过时的或者在新条件下不适用的东西而摒弃了。这就在我們的世界运动內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理論和实践这个重大問題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使人們忽視思想問題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把社会民主主义說成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或者是不需要在思想上作任何根本改变就可以被爭取过来，成为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支有用的同盟軍。

这不仅是危险的，使人們忽視我們共产党作为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作用，而且不可避免地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滲入我們自己的队伍打开方便之門。那样我們就会成为左翼工党的“鞭策派”，而不能看到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资产階級思想的一种形式，它有时像右翼社会民主党一样对階級敌人有用。有时，它在出卖工人利益方面甚至比右翼社会民主党更有用，因为它用比較有战斗性的言詞来掩盖它的反动行徑。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話，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我們扼要地援引如下：

“事实上，‘工会运动的政治組織’或‘政治表現’这两个概念是錯誤的。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



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最坏的反革命分子”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

但是，今天不是有许多人有忽视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主要因素的危險嗎？在我们看来，甚至连苏共纲领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苏共纲领說：

“历史經驗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既在意识形态上也在政治上的破产。即使在改良主义政党执政的时候，它们也只限于进行一些局部的、不触及垄断资产阶级統治的改革。反共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引入了思想政治的絕境。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苏共纲领

并不是反共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引入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絕境。反共主义只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思想观点的必然結果。

我們认为，这会造成把在这个問題上的战术与目标混淆起来的危險。我們的战术是尽一切可能同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群众联合行动，而我們的目标则是从劳动人民的脑海中清除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使他們树立真正的工人阶级观点，了解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群众自觉地支持我們共产党。我們认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那就是敞开大門让修正主义进来，并取消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产党。

我們认为，在新西兰按照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路綫，并結合我国情况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反对垄断資本展开更为有效的斗争的时候，我們所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工人思想的影响。对我们來說，建立工人阶级的統一战綫是起点。而在这方面，这种思想立即就起了阻碍作用。它使人們接受現狀，认为进行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人們只需依賴工党領袖就可以了，而工党領袖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們本身就是垄断資本的工具。这种思想造成了一种观念，即“領袖們会安排的”，群众是无足輕重的，他們的全部作用只是每隔三年乖乖地投一次票而已。

这就是我們在新西兰所面临的情况。

在我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维护帝国主义、即垄断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的一根重要支柱。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变种。

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日常斗争中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們影响的工人群众一道，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但是，与此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須同社会民主党严格而清楚地划清思想界綫，并且努力把正直



的工人阶级分子争取过来，使这些人能够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开展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新西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变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正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我们并不想制造一种幻想，以为在群众当中正在形成一种牢固地建立在斗争的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思想观点。情况并非如此，但是，相信新西兰工党下次当选后将会解决工人的问题这种看法却正在迅速消失。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所以能有影响，往往是依靠大多数产业工人认为工党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要好一点这样一种不牢靠的情况。

我们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落的时代，这种发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担心，这一方面的情况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被指出来。相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在改变的幻想似乎正在日益滋长。

列宁是怎样阐明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队伍中产生的呢？他认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大体上是这样说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不严重影响当时不断增长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况下，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里造成一个“工人贵族”。列宁说事实上，由此所造成的工业化国家内阶级斗争的削弱，使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所有盈亏账上得到了盈余。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什么资本主义在使人民群众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的，那个时期是他们迅速扩展的殖民帝国进行最残酷、最严重的剥削的时期。但是，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有阵地的国家里，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向劳工运动领导人吹捧夸赞，给他们荣誉，给他们拿干薪的差事，对最有能力的一部分工人，则在牺牲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下让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等等，来收买劳工运动的。统治阶级的这种手法，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西方”的整个地区以及当时的英帝国的某些部分，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普遍采用的。

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这样写道：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来说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

“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阶级以及高级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

“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

“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现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



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我們談這個問題是因为在我們看来，下面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說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因是如同列宁所論述的那样，那必然就意味着，現在，由于帝国主义在沒落，它从事剝削活动的范围在縮小，可以进入的新地区很少，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危机也因而日益加剧，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消失。

我們必須充分掌握住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正在衰亡的思想这一观念，并且认清它的种种含义。这样，我們各党在这些国家里的领导作用将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将有可能在坚持原則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策略。如果我們不明确这一点，那就会作出不必要的让步，就会产生幻想，认为必要的統一战綫工作本身就是目的，就会认为抛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一切伪装的工党領袖，不再是老板的工具，不管是有意識的还是无意識的工具。

我們认为，今天在我們的世界运动中正是沒有明确这一点。我們希望能作出更加深刻的分析。

不幸，我們去莫斯科的代表团所表达的上述这些看法沒有得到任何贊同，虽然在会談結束时大家同意有必要更深刻地分析有关当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并且表示欢迎我們参加作这种分析。

###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无疑，这个国家里許多积极关心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人过去一直认为，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下所发生的情况，对新西兰來說，是一个有点学院味道的问题。

我們自己曾經一度陷入这个陷阱。但是，事实上，結果证明它不但对我們的整个世界运动，而且特别是对我們新西兰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南斯拉夫，我們从理論和实践中看到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开倒車的例子。之所以出現这种开倒車的現象，是因为他們把人們从列宁的許多著作中可以讀到的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早期修正主义者的理論付諸实行了。

因此，我們认为，批判地审查而不是欢迎回到我們的队伍来，才是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采取的态度。

我們认为，自从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以来，铁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絲毫沒有改变，而一九六〇年的會議极其严厉地譴責了它。他們可能进行了一些改良来消除南斯拉夫国内的某些弊病，但是，这些改良是在修正主义总的范围内进行



的。如上所述，我們认为这个问题同我們刚刚谈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是个重要问题。

我們认为，尼·謝·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初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代表苏共表示的目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是违反一九六〇年声明的。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在保持南斯拉夫現存的“社会主义”和鼓励其发展的借口下，朝着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归队的方向走了第一步。如果要作任何修改的話，都需要經過世界性的集体討論这一点則被忽視了。

我們將引用我們党签了字的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声明中的一段話。这个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是这样說的：

“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陣营，使它依賴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們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我們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們认为另外有些人却是改变了。他們不再支持八十一党声明。我們要問，如果不經過集体研究就可以加以改变的話，那么作出决定又有什么用呢？

同时，我們要強調指出，我們絕對不应当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的問題上发生思想混乱。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正确的。但是我們說的是共产党人之間的关系，我們觉得，看到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而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却断絕了关系，这是令人非常不安的。

尼·謝·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还說：“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



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

我們同意尼·謝·赫魯曉夫当时的态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論根本上是沿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倒退，难道不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仍然坚持他們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三种力量的概念，那就是說他們繼續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正如尼·謝·赫魯曉夫过去曾經清楚說明的，这是背叛，那么，为什么現在却不是背叛了呢？

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应当縮小到次要地位，必須避免企业由国家集中管理，不应当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們的这种观点改变了嗎？沒有改变。今天，他們可能試圖糾正分散化所引起的某些重大弊病，但是他們只是作些拙劣的修补工作而已。我們重复一遍，他們的修正主义理論仍然沒有变，其結果也仍然沒有变——在工业上，存在着一种新的自由企业家，他們事实上是按照同资本主义公司的經理一样的原則办事的；在农村，小块私有土地正落入数目越来越少的一些人的手中。

我們认为，南斯拉夫新宪法只是证明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問題的結論是正确的。我們不能认为米·安·苏斯洛夫對我們的代表团所說的下述这番話是有力的答复：

“关于我們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我們的印象是，在这个問題上，你們的了解是錯誤的——关于你（維·乔·威尔科克斯）在北京所談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講話。我們希望，更好地了解事实会使你們回到較正确的立場上来。南斯拉夫领导人过去曾經犯了重大錯誤，我們曾經十分正当地本着有原則的方式批評了他們。但是，我們必須正視这个事实：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們有一个共产党，我們的国际义务是，不仅仅无休止地重复你們就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所講的話，而是应当尽我們的最大力量，幫助他們克服他們的錯誤，恢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作用。不能說，我們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是违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然而，当这种行动給予南斯拉夫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以更大鼓励的时候，人們就可以說这些行动是违反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了。我們过去就曾經說过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結果。我們現在仍然持这样的看法！

另一方面，人們可以問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不采取这种态度呢？他們在給新西兰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信中說过，他們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它的领导犯了“錯誤”。那么，为什么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呢？

苏联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同意修正主义是我們的世界运动中的主要危險，他們当时对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划为修正主义者並沒有疑慮。人們只能认为，他們在上述講話中所提到的錯





誤是指修正主义的錯誤。为什么可以同修正主义者紧紧握手以帮助他們，而拒絕同那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人紧紧握手或帮助他們呢？說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罵人和誹謗人”太甚了，这并没有回答問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有着謾罵和誹謗苏共领导的突出的纪录，他們絲毫沒有道过歉，也沒有承认过錯誤。

这不仅是我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多次提到的在原則和实践問題上的混乱的又一个例证，而且是同修正主义日益亲近的例证。难道不是这样嗎？

我們的話就說到这里吧。

### 結束語——在新西兰的任务

上面我們试图簡要說明我們对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分歧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方面的观点。我們沒有特別挑出苏共领导来談，因为其他許多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們之所以不能不談談苏共领导的观点，是因为他們的观点具有普遍的广泛影响。

可是，我們不能接受去年八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会談中苏斯洛夫向我們代表团表明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一看法，当时，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說：

“最后，我們請你們注意下述情况。一向对兄弟的新西兰共产党抱有兄弟般的同情态度的苏共中央，对新西兰共产党领导目前的立場感到不安。我們认为，你們党由于背弃宣言和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由于疏远了共产党兄弟大家庭，正在走上很可能給你們党造成严重損害的錯誤道路。

“我們认为，坦率地向你們指出，你們現在所持的态度可能給你們党、給新西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带来多么大的損害，是我們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們认为，我們两党——苏共和新共——之間的分歧还没有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而且，也没有客观原因妨碍苏共和新共恢复兄弟关系。如果新共领导表现出对当前事态有所了解的話，如果它設法争取到足够的力量来維護世界上絕大多数共产党現在所奉行的唯一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話，它就会胜任它在当代复杂形势中所面临的重大任务。要这样做，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

“就我們來說，我們党将尽一切力量来保持一向标志着我们两党之間的关系的兄弟情誼和誠意，这种关系首先符合新西兰共产党的利益、苏联共产党的利益、你們国家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苏維埃社会主义联盟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坦白地說，这番話很像是說：“要同意我們的观点，否則你們就不再是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部分了。”但是，任何一个党都沒有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人們把这种言論称作“揮舞指揮棒”。普通的新西兰人，無論是在共产党內，还是在共产党外，都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态度。我們确信，苏共领导終于会認識到这种态度是多么不对，因而在同其他兄弟党举行任何討論时将不采取这种态度。



我們认为，对一些問題有意見分歧，并不排斥兄弟关系。事实上，我們同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所会見的苏共主要代表的关系中也沒有发生任何这样的破裂。而且，下述事实也說明了这一点：在我們两党双边会談結束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和我們的代表团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还提到将进行进一步考虑和討論。这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目前，事情就处于这种情况。

在新西兰，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里，在圍繞着我們自己的党綱展开的活动中，在反对国际垄断資本越来越厉害的入侵的斗争中，在反对日益扩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在爭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斗争中，实践将证明我們的意見是正确的。

如果我們全神貫注于在国外进行爭論，以致忽略了我們在國內的經常活动，那将是致命的錯誤。我們的工作就在新西兰这里。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政策帶到工业企业、輪船、矿山和农場中去。我們必須爭取到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影响越来越大。

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衰落給我們党、給新西兰工人階級和所有进步人士不断带来新的問題。但是，它也为工人階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机会。

我們这里反对像殖民制糖公司这样分布很广的垄断資本——这种垄断資本的活动严重地影响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的直接斗争表明，需要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有正确的思想認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这样一些方面，如我們爭取改善社会保险的斗争，爭取較好的教育和改善設備的斗争，爭取把稅收負担加在大企业肩上和減輕工人、农民和其他收入少的人的負担的斗争。

我們在为新西兰工会运动制定一項更富有斗争性的政策而努力，这种努力牵涉到工会运动是朝着階級調和的方向发展，还是依靠階級斗争作为主要因素的問題。如果我們看不清資產階級国家的性质，我們就会开始认为，我們的“国家”——一个資產階級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事实上，它保护的却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它对被剝削者不可能是“公平的”。

这就是我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扼要指出的意識形态對我們有直接影响的方面。

此外，我們还要竭力使那些认为工党能解決問題的工人和其他的人認識到，不管有多少工人参加它，工党今天也是一个支持大企业的政党，因此是一个資產階級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工人的政党。我們的这种努力是这场意識形态斗争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政策，不是人数或名称。这也就是我們对待意識形态問題的态度的最重要之点！

子

我們爭取和平的立場也是这种意識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按照我們的立場，我們說，为了



争取可靠的和平，我们必须努力消灭帝国主义，而决不帮助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着现代战争的根源。

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新西兰人确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正因为这些情况，而且正因为我们的理由是正大光明的，所以我们直言无讳。新西兰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广泛的兄弟关系的一部分，不仅有权，而且也有责任表明它的观点。这是我们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和为了我们新西兰运动本身的前途的利益所应尽的义务。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如果发生分歧，应当采用辩证方法来解决。如果照这样做，那么就会出现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的了解和新的团结。这就是新西兰共产党在表明它的观点时所抱的期望。如果采取这种态度的话，目前的“争论”事实上会加强我们的整个国际运动。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创造性地把它运用到一九六四年的世界局势中去。

因此，就我们运动在世界范围取得的进展来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纲领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围绕它积极开展活动，那末，新西兰共产党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就会在工人和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的一切人中间日益扩大。

工党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宣告来到的虚假的“红色”曙光已经消失。但是，我们可以像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地相信，真正的红色曙光正在到来，新西兰工人将在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根据新西兰英·普林特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译出】



# 馬來亞人民的經歷駁斥了 修正主義者的謬論

——紀念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十六周年

《馬來亞箴言》月刊

愛國的、反殖民主義的馬來亞各階層人民本月（六月）驕傲地紀念馬來亞人民向英帝國主義展開武裝鬥爭十六周年。十六年前，英帝國主義的武裝部隊凶惡地和背信棄義地屠殺了曾經幫助英國打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隊的英雄兒女；從那一天起，有人多次企圖蒙蔽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起源和實質。

英國官方同一些無原則的“歷史學家”、無知的僱傭文人和革命事業的叛徒串通一氣，歪曲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為“恐怖”組織、“外國顛覆分子”的代理機構，等等。

對這些顛倒事實和歷史的人來說，遺憾的是，馬來亞人民這些年來所進行的英勇鬥爭是不能泯滅的真理的記錄；凡是不怕真理的人，都可以看出，誰是恐怖分子，誰是撒謊者。更重要的是，公正的觀察家可以親自看到，帝國主義者及其在馬來亞的代理人註定要完蛋。凡是不能從十六年來的證據得出這個結論的人，必定是愚不可及。

## 武裝鬥爭的正確性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馬來亞人民愛國力量，決定以武裝鬥爭對付帝國主義者的武裝進攻，這是極其正確的。暴力必須用暴力來對付。這是生存的第一規律，是科學的革命的的第一條準則。此外，某些禍害只能用暴力來鏟除，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禍害——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暴力行動才能鏟除。在整個世界史上，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有任何這樣的例子，即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勢力範圍內的民族、人民或集體能夠不通過某種形式的武裝鬥爭（即暴力）而獲得解放。當然，有一些靠帝國主義恩賜的所謂“自由”而獲得假“解放”、半“解放”和“獨立”的國家或集體。要是馬來亞人民要這種“解放”和“獨立”的話，他們



早就可以得到了。在过去二十年里，的确有人曾經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表示願意”給他們这种“解放”和“独立”；但是他們蔑視了这种“建議”，他們忠于馬來亞和全世界的反帝事业，并将永远如此。

在十六年前作出进行武装斗争这一重大决定时那些对武装斗争是否明智表示怀疑的人，很快就发现他們是錯誤的；因为他們越是向帝国主义的暴力和詭計屈服，他們就越是遭殃。这从反面來說，也是生存的第一規律和科学的革命的第一条准則。

共产党领导的馬來亞人民爱国力量对局势和問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們由于作出了以人民的暴力抗击帝国主义暴力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从而使馬來亞免于遭到彻底的破坏和征服，而且对削弱亚洲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要是当时沒有能够及时作出以人民的暴力抗击帝国主义暴力的正确决定并且坚持执行到今天的话，那么，就談不上今天馬來亞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也談不上等待着他們的光明前途。

## 暴力的作用和倫理

自从西方在十五世紀开始实行殖民統治以来，在过去五百年左右，平均每年发生两起有組織的鎮压人民的战争。这还不把所謂“綏靖”活动計算在內，而伴随着这种“綏靖”活动的是集中世紀的、中世紀以后的和現代的帝国主义鎮压之大成。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同暴力分不开的。行动中的帝国主义（即从帝国主义开始出现到死亡为止）本身就是暴力的化身。因此，不論是在原子时代或在弓箭时代，只是通过对受害者施加最大限度的实际压力，也就是說，只是通过使用压迫国的非常有組織的武装部队，才得以征服其他民族的領土和蹂躪其权利的。

不論在原子时代或在弓箭时代，統治和暴力始終是压迫国的日常陰謀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也是事实。压迫者“統治”他們“自己的”劳动人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对压迫者同被其套上殖民主义枷鎖的人民之間的关系來說，更是如此。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侵略国初期用武装力量和暴力行动对一个民族实行征服和鎮压之后，对殖民地的被征服、被压迫和被剝削的民族來說，也不存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东西。在征服的初期以后，仅仅沒有采取軍事行动这种現象不管持續多久，适足揭穿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剝削和鎮压的真实性质。

那些根据第一手材料研究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尤其是身受殖民統治之害并起而斗争的人，很容易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初期軍事征服行动的結束，仅仅标志着一个长期



的、折磨人的暴力“綏靖”阶段——英国官員們所謂“維持法律和秩序”阶段——的开始。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上述这一点是多么千真万确，在每一个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由于“綏靖”和“維持法律和秩序”行动而死于非命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在軍事征服的初期被杀害的人数。

最后，在压迫国的“法治”“确立”的时候出現的所謂“保护”和“和平演变”时期內，死于純粹的剝削、貧穷和疾病的人数，甚至超过初期的軍事征服时期和“綏靖”时期死亡的总人数。馬来亚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和現在的每一个殖民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关于曾經有过或者可能有过所謂殖民主义“和平地”来临或保持之类的說法，适足揭穿压迫者自己或其代理人編造的神話，其目的在于欺騙他們現在的和可能的受害者，和窒息公众发自内心的責备的声音。

馬来亚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和爱好自由的普通人民一样，从来沒有主张过——更談不上实行过——为暴力而暴力。他們热切地珍視和平；事实上，他們在为抵抗法西斯占領者作出輝煌的和无私的牺牲之后，正在为和平地取得政权作准备的时候，却被他們在战时的“同盟者”（英国政府）凶暴地、背信弃义地从背后刺来一刀。馬来亚人民也不得不重新認識到，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改变它的本性，“英国統治下的和平”，正像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一样，是奴役、民族消灭和死亡的“和平”。

那些爱从哲学上来談暴力的伦理的人应当記住，世界上沒有使用暴力的特权这回事。这种“哲学家”怎么能够当真认为，拥有最大的战舰和轰炸机的国家可以用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別人却由于某种神圣禁令的約束不得使用暴力来自卫呢？如果这种“哲学家”的論点在不容置辯的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話，那末，他們散播他們片面的“伦理”究竟目的何在呢？說穿了，他們的“伦理”原来是海盜、掠夺者、杀人犯、十足的伪君子的“邏輯”和“伦理”！他們实际上是說：“伙計，別忙！我扭断你的脖子，这沒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想踢我一脚，那就是彻头彻尾錯誤、不道德的恐怖行徑”！

### 解放运动和共产党的事业是无懈可击的

在良心和志向上洁白无瑕的人捍卫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是沒有任何顾虑的。他們的思想感情不受任何隐私的搅扰，这种隐私像某种見不得人的恶癖一样，是由适应某种特殊需要的药物养成的。帝国主义和他們的辯护士典型地表现了双重标准和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无恶不作。看看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礼拜天在教堂里祈禱“和平”、礼拜一却去枪杀某个人的儿女，这确实是上了一大課。馬来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过去有，現在也还有；



毫无疑问，凡是帝国主义插足的地方，这种事情过去天天有，现在也还是天天有。

马来亚爱国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不论怎样诡辩，怎样哄骗，这种事情是抹不掉的。事物产生的过程是：旧的不破，新的不立。

关于这一点，在旧秩序（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中占压倒多数的西方国家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的统治阶级本身也经过了同样不可避免的暴力推翻旧事物——封建社会——的阶段，然后才能建立它的霸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霸权。

早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就在世界各地发出根本性的警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的末日已经开始。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被压迫国家人民纷纷取得胜利，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进入最后土崩瓦解的阶段。

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甚至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几年前，当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谈到殖民地的“变革之风”时，事实上就是带着恐惧和忧郁的心情反映出帝国主义者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他的政府企图阻擋这股“变革之风”，或把它引入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某种安全的轨道，但是被压迫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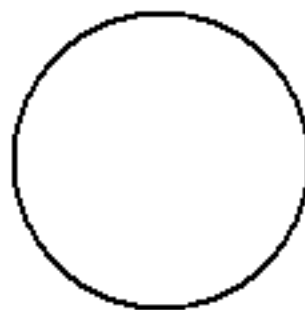
因此，无论是根据历史的规律还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主观的承认，被压迫国家人民走向自由的突飞猛进，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在道义上和伦理上是完全无可非议的，肯定是不可战胜的。

在作出走上这条斗争和破旧立新的道路的决定时，共产党所领导的马来亚爱国者不仅没有理由感到遗憾，而且有一切理由感到高兴，因为自己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完全正义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一边。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将更加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直到达到光荣的目的。

### 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

现代修正主义的发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许许多多麻烦，如果说马来亚解放运动没有身受其害，那是无益的。

是的，马来亚也有其现代修正主义的份额。我们的花园也受到了这种流行病的侵袭。马来亚人不必因为承认这一点而感到羞耻。承认是说明决心进行自我改造的第一步，这显然是健康的、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马来亚解放运动也不免受现代修正主义之害，任何人无需为此感到吃惊。马来亚毕竟是



一个殖民地；正如在历史最悠久和最受尊敬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堡垒——苏联——发生的这种可悲景况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免于这种疾病之害。即使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之后，也不能說人类的思想就能完全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然，由于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存在以及倒退的准则和实践复辟的物质基础也就随之而缩小。但是，除非把革命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作为争取解放、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过程的一部分来进行，否则就可能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一、較老一代的有些人可能回到旧有的思想作风中去；二、在較年輕的一代中（他們沒有经历过革命思想、生活和斗争的严格的锻炼），有些人可能犯上一种新的社会病症，而仿佛这是新社会带来似的。

仍处于殖民地地位的馬來亞如何能免于已經侵襲了一些远为强大的堡垒的病症呢？現代修正主义——正如其历史上的前身古典改良主义一样——是帝国主义武器庫中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国家人民，使他們陷于混乱和分裂时，所凭恃的不单单是武力。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还借助于心理战——英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帝国主义者在他們的心理战中所使用的“秘密武器”之一是散播假革命的，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这比原子弹危险得多，因为它们通常是以革命的，甚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色彩很好地伪装起来的，并且是由重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甚至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成員散播的。

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是，在世界上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注定要失败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社会主义和反帝阵营的大門口竟然受到帝国主义心理作战部門散布的意識形态細菌所带来的最有毒性的传染病的袭击。然而，再思索一番，这种矛盾一点也不奇怪或令人吃惊，虽然这显然是严重的。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意識到自己的末日就在眼前，因此把最后一件最危险的秘密武器投入了战斗。在工人阶级反帝运动的整个历史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統治阶级的最危险的秘密武器向来是制造思想混乱、进行歪曲和传布修正主义。镇压馬來亞解放軍的前英帝国主义部队司令田普勒將軍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武器，命令他的軍隊把屠杀同“争取人心”結合起来，从而从他的帝国主义主子那里得到了高官厚祿。英国殖民当局使用了类似的武器，收罗英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叛徒，在馬來亞人民中間鼓吹現代修正主义的理論。这些叛徒也得到了他們的帝国主义主子的豢养。

关于帝国主义者的心理战的这种例子既不新鮮也不罕見。总的說来，馬來亞人民已經通过“反面例子”从帝国主义者的丑剧中吸取了教訓。但是，馬來亞人民，特别是爱国者必須从





現代修正主义的发作中吸取教訓。除非把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日常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进行下去，否則这场斗争就可能遭受严重的障碍。作为这个重新估計和全国性自我整风时期中的第一步，馬來亞爱国运动的各个部分必須有条不紊地揭露和清除它們的活动各阶段中出現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們必須警惕帝国主义的阴险宣传，这种宣传說什么現有的意識形态分歧只是或者主要是“莫斯科和北京”的事；或者說这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事；或者說这种問題只同理論家有关，等等。帝国主义者传布这种宣传，其目的不仅是要解除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武装，而且是要解除广大的爱国反帝运动的武装。現代修正主义的病菌襲击着每一个人，不論是共产党人还是僧侶，不論是理論家还是空想家。这些問題也不能是“最好留給莫斯科和北京”。采取这样的态度（又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在煽动），如果不予制止，其結果将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能对国内外的反帝斗争作出貢獻。

### 如何識破現代修正主义思想并与之作斗争

只有勤奮和建設性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別无他途。沒有健全的、日益加强的意識形态基础以及察觉、識別、决断和行动的能力，就不能胜任应付所面对的任务。

務必反对理論学习方面两种同样有害的傾向。一种是在具有資产階級教育背景的那些人中間普遍存在的有害的知識分子抽象主义傾向。这种傾向表现为傲慢地脫离构成革命运动的不可分割部分的人物和事件。只要看一看同取得成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形成对照的那些遭到失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由知識分子抽象主义者领导的党，能在短短的时期里变成怎样无用的东西。

另一种傾向是“在思想上当懶汉”，那就是一种小資产階級情緒，这种人事实上在說，工人階級錯不了，因此不需要理論。有这种言論和这样工作的人落到如下的下場时不能怨誰：自己站在一个新法西斯运动的前列，而这个运动是由来自工人階級和农民中一向瞧不起理論的一伙蜕化墮落的最卑鄙的流氓无产階級組成的。

在反帝队伍中，上述两种傾向都是不能容許的。任何时候都必須提高政治觉悟水平；否則，帝国主义的新的阴謀詭計或新殖民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所施展的阴謀詭計就会得逞而在爱国者队伍中造成大破坏。

現代修正主义的阴謀詭計是不难識破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辯护士会用辞藻和政治姿态伪装出一副革命架势来，这正是他們的不可避免的弱点之一，但只要稍加追究，他們的帝国主



义和反革命的真正本性总是可以揭发的。

馬來亞共产党在最艰苦的年代里对馬來亞人民解放斗争的坚强和明确的领导，一直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诡计的唯一最大的障碍。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馬來亞人不惜从帝国主义的垃圾堆里捡起诸如“共产党不能领导”、“沒有影响”、“采取了錯誤政策”等等污蔑来中伤馬來亞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臭名远扬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也玩弄起誘騙馬來亞的久經考驗和最忠心耿耿的党的把戏来，他們无疑希望为建立修正主义的领导打开一个缺口，以保证馬來亞奉行同西方帝国主义“和平合作”的政策。

### “馬來亞”的严峻考驗

由于馬來亞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已經順利地展开了反对危险的帝国主义阴谋——“馬來亞”的斗争的新阶段。今天，从反对“馬來亞”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发展开来的馬來亞內外的范围广泛的反帝行动，已成为全面反帝斗争战场之内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反对“馬來亞”的运动中已經积累起丰富的經驗。无疑，这些經驗中有許多現在已經为今后的行动提供了无可估价的教訓。

反帝斗争的反“馬來亞”阶段也是对朋友和敌人的一次严峻的考驗。由于馬來亞解放运动决心把对抗“馬來亞”的政策执行到底，它在国内外赢得了許多朋友。与此同时，許多假朋友被揭穿了，其中主要的是现代修正主义“同志”，他們企图灌輸他們的同“馬來亞”和解或“緩和”对抗政策的思想。

时过不久就发现，跟着国外某些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走的这些“同志”，实际上是把“馬來亞”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下来，一有机会就企图推銷他們的背叛政策。凡是真正反帝的人都不能在“馬來亞”問題上妥协。必須粉碎“馬來亞”，必須根除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占领和压迫机构，然后才談得上停止反“馬來亞”的运动。

不仅如此；反“馬來亞”运动的現阶段必須加紧和加强，来同現在在东南亚达到新高潮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結合起来。一九四八年六月以来，民族解放斗争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美帝国主义对在印度支那地区的馬來亞的近邻发动了不顾一切的进攻。馬來亞的爱国者可以为他們声援相邻地区的兄弟姐妹而感到自豪。馬來亞爱国者不管处境怎样困难，一向毫不犹豫地給予他們的反帝同志以兄弟般的支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加强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不断高涨，是馬來亞共产党不辞辛劳进行领导的直接結果；因为馬來亞共产党取得了这种成就，它就遭到揮舞指揮棒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铁托



之流的朋友們的怨恨和煞有介事的“非難”。

民族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加强，也是对一些时候以来折腾某些地区解放运动的地方“革命家”及“和平演变者”派的胜利。地方观念和議會政治的白痴症必須从馬來亞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清除掉，因为这是滋长现代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主要場地之一。

## 历史的裁判

那些反对或者阻撓馬來亞人民爭取自由的斗争的人从两种立場出发：一、帝国主义者立場，二、现代修正主义者立場。前面一种立場是容易了解的，不需要加以解释。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立場却比較复杂。现代修正主义者会大叫大嚷說他們也反对“馬來亞”；但是他們反对并企图破坏对抗“馬來亞”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制造紧张局势”，“有可能引起战争和全面大战”。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声称他們支持馬來亞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們公然放肆地攻击馬來亞人民的武装斗争是胡乱浪费生命，是想“壮丽地死去”的幼稚表现，他們无耻地扶植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領袖”来把馬來亞革命引入“安全的”軌道。现代修正主义者宣称他們尊重被压迫人民自决的自主权利，但是他們却协同发起帝国主义势力在作恶的联合国向馬來亞和其他发生激烈斗争的地区派出“調查”小組、甚至派出“監察”小組，企图利用所謂的“联合国部队”去压制爱国者的解放力量，由此可見，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在馬來亞制造一个“剛果”的危险是始終存在的，必須对此保持最大的警惕。

在过去十六年中，馬來亞爱国者所担当起来的具体任务是艰巨的。历史决定了东南亚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坟墓之一；这个地区的爱国人民有多年的宝贵經驗和极其丰富的传统，他們以只有善于把痛苦化为力量的人才具有的决心和坚定性，一定能够完成埋葬帝国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裁判已經給帝国主义下了判決；这也就等于在这场斗争中已經打赢了一半以上。

馬來亞人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加强决心，以使最后的解放加速实现。

【原載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馬來亞箴言》月刊】

